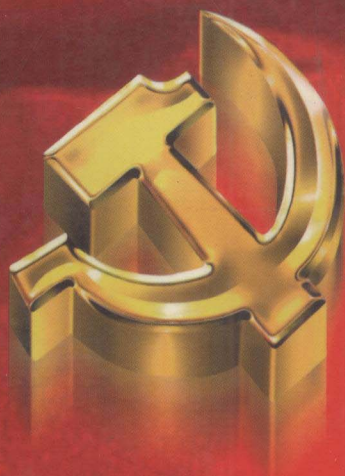




世纪进军

新时期领导干部十五规划精神
学习读本

人民日报出版社

第三卷

五十年辉煌

成果展示



1989年11月9日,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和江泽民亲切握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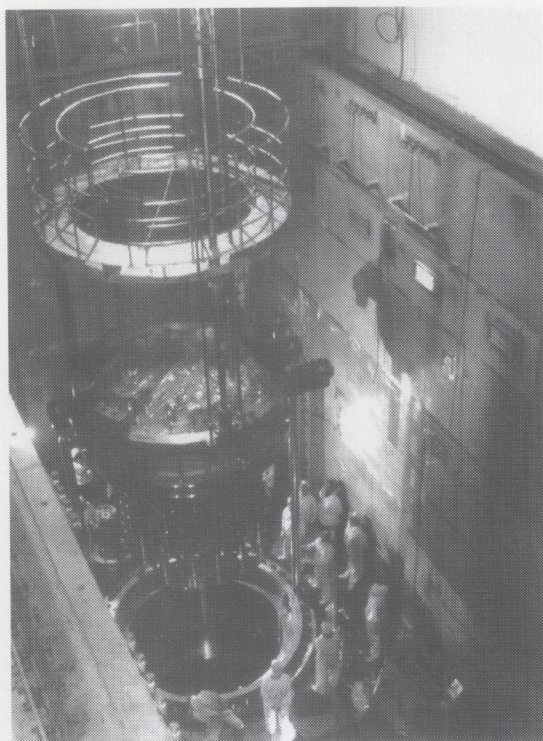
1991年夏,我国江淮和太湖流域等地区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7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涉水察看江苏省苏州市灾情。

长江干流上的第一座大坝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1970年开工,1987年全部建成。大坝全长2600米,坝高70米;整个工程装机21台,总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157亿度,是世界上大型水电站之一。(1990年)





1992年岁首,邓小平在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参观。邓小平这次南巡讲话强调改革开放“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1990 年 10 月，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装机容量 30 万千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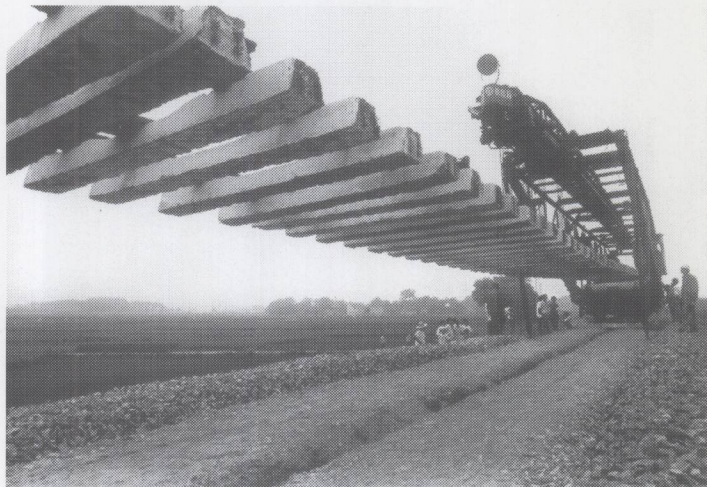


武钢晨曦。武汉钢铁公司年产钢材 450 万吨，是中国最大的钢材生产基地之一。（1990 年）



坐落在广州市环市东路的广东国际大酒店，楼高 218 米，被列为世界同类结构建筑物的第十五位。（1993 年）

京九铁路合(肥)九(江)段的建设者们以每天 1.8 公里的速度铺设路轨。（1993 年）



1996 年 3 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海军先后在东海和南海举行了气势磅礴的诸兵种联合作战实兵实弹演习。



1998年夏，我国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8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湖北洪湖市乌林镇中沙角险段水文站抗洪点，向潜水员了解情况。

在江西九江防洪墙决口处，解放军官兵用身体挡住巨大落差形成的湍急水流。经过5天的奋战，60米宽的决口被堵住。（1998年）



1997年11月8日15时30分，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中国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实现截流。成功截流标志着三峡一期工程顺利结束，工程建设全面进入第二阶段。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图为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和中外记者见面。

1997年7月1日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在庆典仪式上，展示了国家主席江泽民题写的“香港明天更好”书法卷轴。



1999年5月15日，当选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的何厚铨接受推委会委员们的祝贺。

第一篇 中国经济五十年风雨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以聪明智慧、勤劳勇敢而著称于世。然而，持续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使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迟缓的状态。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构成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加上战争不断，经济十分落后，劳动人民生活十分贫困。近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苦苦探索推翻三座大山救国救民的途径，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最后，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道路。

第一节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绘制 新中国建设蓝图

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具体政策措施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为解放全中国和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指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必要性；规定了全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中国共产党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这就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当全国即将解放之际，如何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改组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就历史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并且提出了实现这一纲领的具体政策措施。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确定我国建国以后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其主要内容是：

1. 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2. 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尽可能地利用其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等方面，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限制政策，使之在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轨道内发挥积极作用。

3. 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基本形态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然而，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废除，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个体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的。生产的、消费的信用的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是个体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形式。

4.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即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胜利后存在的两种基本矛盾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依据这一分析，他提出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毛泽东同志还特别强调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指出其它各项工作都应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其服务。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从当时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实际出发，确定的基本方针政策，于1949年9月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采纳，成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准则和奋斗目标，有力地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二、新中国面临的经济困难

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新中国人民政权接收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当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并着手恢复经济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

1. 工农业生产能力遭受极大破坏。1949年与抗战前最高年份比，农业产值降低20%以上，其中粮食产量由2774亿斤减到2162亿斤，降低22.1%；棉花由1698万担减到889万担，降低48%；生猪由7853万头减到5775万头，降低26.1%。工业产值降低了一半，其中重工业降低约70%，轻工业降低30%。原煤产量由6188万吨减至3243万吨，降低47.6%；钢由92万吨减至15万吨，降低62.6%；棉纱由245万件减至180万件，降低26%。

3. 交通运输能力破坏惨重。上万公里的铁路，3200座桥梁和200多座隧道遭到严重破坏，主要铁路干线没有一条能全线通车，机车损坏1/3。公路破坏严重，到1949年底，虽经抢修，仍有20%里程不能通车。海运方面，华北地区海轮全部被国民党反动派劫走，仅剩下上海港14.5万吨轮船。原民航所有飞机、飞行员及器材全被带往香港，空运能力几乎全部丧失。

3. 城市物资严重匮乏，农村水灾严重，人民生活十分困苦。由于战争和交通的梗阻，

使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物资严重匮乏，1949年5月，上海市粮食、煤炭已难以为继，棉花仅够纱厂一个月使用。全国农田水灾面积1.2亿亩，灾民4000多万人，其中重灾区占2800万亩，700万灾民急待救济。另外，城市有失业的工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约400万人生活十分困难。

4. 投机活动盛行，市场物价飞涨。由于交通不畅，物资匮乏，投机资本家乘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1949年4月，京、津等地投机资本利用华北地区春旱，哄抬粮价，涨风波及华中、山东、苏北。7日，上海投机资本操纵市场，使米价飞涨，导致物价全面上涨，并且波及华北、华中，10月，北京奸商制造“粮荒”谣言，以粮价带头掀起涨风；接着上海投机资本家以纱布、五金带头涨价，扩大涨势。在操纵物资涨价的同时，投机资本还进行金融投机，给经济造成更大的破坏。

1949年物价大幅度上涨，若以1948年12月为100，全国13个大城市批发物价指数1949年1月为153，4月为287，7月为1059，11月达5376。物价急剧上涨，破坏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转，威胁人民生活，加剧了国家财政经济的困难。

5. 国家财政经济极端困难。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造成的经济困难，1949年国家财政收入虽经多方努力仅为303亿斤小米。政府在承担巨额军费的同时，还要致力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解决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数百万军政人员的生活问题，还要救济灾民，财政支出至少需要576亿斤小米。这样，有1/2的财政收入无法落实，不得不靠发行通货来弥补。

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人民政府肩负起挽救经济危局、恢复国民经济的重任，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

第二节 建立国营经济，统一全国财经管理

一、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

人民政权接管城市以后，开始没收国民党政府经营的企业，以及国民党大官僚分子经营的各种企业，主要包括：

1. 金融方面。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把持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及合作金库，以及地方银行等2400多家银行。国民党官商合办的其它银行中的官股，以及中国银行海外分支银行。

2. 工矿方面。有控制全国资源和重工业的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控制纺织业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兵工系统和军事后勤系统所办企业，原国民政府交通部、粮食部等部门所办企业；宋子文、孔祥熙家族和其他官僚的“商办”企业。CC系统的“党营”企业，各省市地方官僚资本系统的企业。合计有工业企业2858个，职工129万人。

3. 交通运输方面。有原国民政府交通部、招商局所属全部交通运输企业。原中国、中央航空公司于1949年11月9日起义，12架飞机回归祖国大陆。

4. 商业方面。有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蚕丝、中国植

物油、孚中、中国进出口、金山贸易、利泰、扬子建业、长江中美实业等十余家垄断性贸易公司。

没收官僚资本企业的工作是在各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下进行的，对原企业机构及人员采取“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正确政策，顺利地接收了几千家企业，迅速复工生产，形成了人民政府的国营经济。国营经济的形成，为国民经济的改组和恢复，为以后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二、平抑市场物价，与投机资本斗争

人民政府利用国营经济提供的物质基础，开始主动回击投机资本家，平抑市场物价，在与资产阶级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中取得主动权，主要措施有：

1. 实行金融管理，打击金银外币投机。1948年11月，由关内各解放区的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12月1日起发行人民币。各城市解放后，立即限期收兑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元券，人民币迅速占领市场。从1949年4月开始，各地政府相继颁发“金银和外汇管理办法”，禁止金银和外汇自由流通，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收兑。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取缔地下钱庄，逮捕破坏金融的首要分子，加强对私营金融机构的管理。这样，金银投机活动初步受到限制，私营银行业务也逐步由国家银行控制。

2. 中央财政委员会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周密安排，以稳定市场、控制物价为目标，以大城市为重点，部署了一场稳定物价反对投机的总体战。

1949年11月1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决定发行公债、整顿税收以紧缩通货、加强征收公粮，并成立全国统一的内外贸易专业公司（粮食、花纱布公司），以统一掌握与调运物资，加强在市场斗争中的力量。

1949年11月5日，中财委决定采取下列紧急措施：①冻结未入市场货币10天，以稳定人心；②各贸易机构抛售物资10天，以收回货币；③停止各机关购存物资；④检查各银行的存款；⑤收缩贷款；⑥加强市场管理。11月20日，中财委发出《关于11月25日起平稳物价具体措施的指示》，主要内容有：①布置京津方面准备布35万匹，纱5000件，从东北调粮6000万斤；上海方面准备布110万匹，纱28000件；汉口方面准备布30万匹，纱8000件；西安方面准备布40万匹。②除特许者外，暂停一切贷款，并按约收回贷款。③自11月25日起征收能起收缩作用的税收，暂停支付除特许者外的工矿投资和收购资金，地方经费中可以迟发的一律迟发半个月至20天。④各地贸易公司从11月20日起，逐渐提高牌价，到11月24日使其与黑市价格持平，然后从25日起一齐开始抛售，抛售时的价格要按市价逐日下降。这些措施逐步出台之后，至11月24日，上海、汉口、天津、西安四大城市物价还相当于7月底的3.7倍，投机资本家见物价上涨，拼命借钱买货囤积，企图从中渔利，及至25日起物价开始下降，他们又急于抛售，结果愈抛愈贱，损失惨重，纷纷破产。而国营贸易公司则利用有利时机，投放货币大量购买物资，作为下一步调节物价之用。同时，人民银行还以小量贷款帮助某些私营工商业户渡过难关。这次全国统一的平抑物价的行动共进行了半个月，到12月10日结束。通过这次斗争，政府运用经济手段给予投机资本以毁灭性的打击，全国物价趋于稳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统一全国财经管理

1949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要求:①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为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②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设立中央计划局、中央财经人事局、中央技术管理局、私营企业中央事务局、合作事业中央管理局、外资企业中央事务局等工作机构。此外,以华北人民政府各财经部门为基础,陆续建立中央财政处、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中央商业处、交通处、燃料处、金属处、纺织处、工业处、农业处、林业处、水利处和中央铁道部等中央财经部门。③在东北、西北、华中、华东等区域及各省各大中城市,均应建立财经委员会及各级人民政府的若干财经部门,并在中央与上级财经机关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1949年7月,中财委组建完成,10月,成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主任为陈云,副主任有薄一波、马寅初、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等。

1950年2月13日至25日,中财委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主要讨论了统一财经、紧缩编制、现金管理和物资平衡四大经济问题。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财经工作统一的决定》的报告。会议决定,在统一财经工作方面要做到:①财政收支统一集中到中央。②公粮统一,除5%~15%作为地方附加外,均由中央统一掌握。③税收统一,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统一集中到中央,每日结算解缴国库。④统一编制,改革编制庞大、人浮于事的状况。⑤贸易统一,各地贸易公司的资金、业务计划、商品调度统一由中央贸易部掌握,地方不能干预。⑥银行统一,现金调动统一于银行。根据这次会议提出的意见,1949年3月,政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对全国的财经工作实行了统一管理。

在全国军民共同努力下,统一财经工作很快取得巨大成绩:①初步统一财政收支,保证了军费开支与重点恢复经济的需要。②统一部署指挥,完成了物资大调运,为救灾、平抑物价及满足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提供了物资保证。③收入增加,支出相对缩减,出现了财政收入接近平衡的新局面。④金融物价转向稳定,从根本上扭转了连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局面。中央财经委员会与各级地方政府,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统一财经工作,建立起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市场,扭转了整个经济的混乱局面,为整个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第三节 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

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

1950年6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同志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刘少奇同志作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陈云同志作了《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在书面报告中肯定了经济战线上取得的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同时指出,这仅仅是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要取得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需要

三个基本条件，即：①土地改革的完成。②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③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此，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必须做好下列工作：①有步骤地有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将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恢复农业生产，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中小土地出租者。②巩固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③在保证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行政系统亦须适当地处理编余人员。④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⑤必须认真地进行对失业人员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⑥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做出决定。⑦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⑧全党应在1950年的夏秋冬三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在会上，毛泽东同志还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和战略部署，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

二、合理调整工商业

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整个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统计，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职工人数为18.3%，固定资产为17.8%，产值占48.7%。资本主义商业在批发总额中占76%，在零售额中占83.5%。1950年春夏之交，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有的私营工商户关门歇业造成新的失业现象。

为了帮助私营工商企业克服困难，党中央通过研究，决定调整工商业。1950年3、4月，党中央先后召开了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调整工商业。会议明确指出，调整工商业的原则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要纠正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想挤垮私营工商业的不正确思想和做法。接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改善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在会上陈云同志发言阐明了调整工商业的必要性、调整的内容和有关政策。

调整工商业，首先是调整公私关系，其实质是在巩固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公私兼顾，使私营经济发挥其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具体方针是：在国营企业已经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掌握了市场金融物价领导权的前提下，国家根据统筹兼顾的原则，在经营范围、原料供应、销售市场、劳动条件、财政金融政策等方面对私营工商业作必要的照顾。并且采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的方式，把它们的生产 and 销售大体纳入计划轨道，使他们从停工歇业中解脱出来，为发展生产、促进城乡交流、恢复经济服务。

调整工商业，其次是调整劳资关系。根据确认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有利于发展生产以及协商解决劳资问题的基本原则，各地私营工商企业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商议解决困难的办法。一方面资方改进经营，节约开支，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工人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劳资双方合力维护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

为了配合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的调整，政府还调整了产销关系，召开粮食加工、食

盐、百货、煤炭、火柴、橡胶、毛麻纺织、卷烟、印染、进出口贸易以及金融等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公私代表与会协商，制订各行业产销计划，力求产销平衡。

通过上述调整，1950年下半年经济情况发生明显变化，私营工业生产逐月增加，各地市场日益活跃。合理调整工商业，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了困难，而且由于将其一定程度地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从而更加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只用短短两年时间，我国完成了统一财经管理和合理调整工商业两件大事，陈云同志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三、在抗美援朝中改组和发展经济

正当我国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开展土地改革和精简军政费用，经济形势日益好转时，美帝国主义于1950年6月25日发动侵朝战争，我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11月15日至27日，全国财政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形势，确定了以国防第一、稳定物价第二，其它第三的财经工作方针，开始了在抗美援朝形势下改组和发展经济的工作。

（一）清除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和反对封锁禁运的斗争

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订的政策，建国以后，我国政府允许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暂时存在，对其加以监督和管制；同时，保护普通外侨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1950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管理我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禁止一切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港口。我国政务院于1950年12月28日发布《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针锋相对，着手清除美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开展反封锁反禁运斗争。1951年4月30日，我国政务院发布征用美国亚细亚火油公司财产的命令。凡有关我国主权及国计民生者均以征用，如美孚、德士古、中美石油公司以及上海电力、电话、电气公司等；关系较小者予以代管，必要时予以征购；一般企业以加强管制为主；美国政府及私人在华占有的土地一律没收。到1953年，基本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经济残余。

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我禁运案，我反封锁反禁运斗争加剧。采取了以下对策：①将外贸的重点转向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1951年，我对苏联东欧的进出口贸易的比重由1950年的25.9%扩大到61.9%。②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改用“先进后出”为主的易货形式，用猪鬃、桐油等国外短缺物资换回我国急需的橡胶、汽油等重要物资。同时，也不放松一般货物的结汇贸易。③利用西方国家之间及内部存在的矛盾，联合私营进出口业采取灵活的非常措施进行贸易。到1951年底，我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总额达9亿多美元，维持上升水平。1952年2月，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我国与西欧国家签订了巨额贸易协议，4月又签订中日贸易协议，10月签订中国锡兰贸易协议，从而进一步冲破了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

（二）逐步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

1. 国营经济进一步扩大，确立了领导地位。1952年，国营工业企业有9500多个，职工510多万人，资产总值由1949年68.9亿元增长到108.4亿元。1952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平均每年递增34.8%。其中国营工业增长287%，平均每年递

增 57%。国营工业的比重由 1949 年的 26.7% 增至 41.5%。交通运输方面，国营企业除在铁路运输中继续保持绝对优势外，在水运和公路运输货物周转量中的比重，也由 1949 年的 43% 与 21%，上升为 75% 和 54%。

在国营商业方面，1952 年底已建立了 3 万多个国营商店，有职工 57.7 万人。它和农村供销社、城市消费合作社一起，形成全国性的社会主义商业网，掌握了各种经济成分生产的各种重要物资，保证了市场的供应和物价的稳定。在商品流动总额中国营商业的比重由 1950 年的 6.9% 增至 16.2%。国营商业在批发总额中的比重，由 1950 年的 23.2% 增至 60.5%。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银行业务有了迅速发展，1952 年存放款比 1950 年增加 2.8 倍，掌握了全国 99% 的银行存放款。国家银行成为现金、短期信贷和结算中心，巩固了国营经济在信贷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在国家财政方面，1952 年国营企业所缴款额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由 1950 年的 33.4% 上升为 58.1%，国家财政收入逐步建立在国营企业提供的利税基础上。

2. 集体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各地建立的供销合作社是个体农民与个体手工业者在流通领域自愿联合起来的集体经济组织，1950 年至 1952 年，供销合作社社员由 2568 万增至 13820 万人，股金由 0.27 亿元增至 2.24 亿元，与城市居民消费合作社一道组成庞大的零售商业网。1952 年与 1949 年相比，各种合作社的零售额由 8.1 亿元增至 50 亿元，在零售额中的比重也由 6.7% 上升为 23.8%；信用合作社亦有很大发展，1952 年全国共有 2271 个，比 1950 年增加 20 倍。

1952 年手工业合作社 3280 个，从业人员 21.8 万人，占手工业从业人员的 3%；产值 246 亿元，占手工业总产值的 3.4%。

同时，农业合作社与互助组也在各地广泛建立，到 1952 年，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 40% 左右，比 1950 年增加 3 倍。其中常年互助组 803 万个，初级合作社近 4000 个。

3. 个体经济发生积极的变化。个体经济在总量增加的同时，比重有所下降。1952 年，个体农业总产值较 1949 年增加 48.4%；个体手工业总产值较 1949 年增长 1 倍多，从业人员增至 713 万人。但由于现代工业恢复和发展更快，1952 年个体手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为 20.6%，个体经济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至 2/3 左右。国营经济通过收购个体经济大宗主要产品，供应所需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并以价格来调节其生产经营活动，将个体经济纳入国营经济领导的范围。

4. 私营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1952 年与 1949 年比较，私营工业户数增加 21.4%，职工人数增加 25.1%，总产值增加 54.2%；私营商业户增加 6.9%，从业人员增加 2.2%，零售额增加 18.6%。

5.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由于国营经济的扩展，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大下降。资本主义工商业中，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不利国计民生的行业都被严重削弱或淘汰。在这一形势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1952 年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有 907 家，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5%。而资本主义金融业则更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1950 年下半年起，人民银行开展了对私营工商业的存放款业务，私营行庄与人民银行联营。1952 年 12 月，因私营行庄普遍亏损，经营困难，国家即对其全部实行公私合营，代理人民银行指定的业务，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